

火烧河口天主教堂

滕振坤

中日甲午战争后，作为帝国主义殖民工具的外国教会和传教士的思想渗透和文化侵略日趋猖獗。中国人民为此而掀起的反洋教的反帝爱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席卷全中国。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铅山、弋阳人民面对教会及其帮凶的侵权罪恶，在义愤孰不可忍的情况下放火烧毁了设在河口的天主教堂。现根据铅山县政协委员、前清秀才崔思敬于35年前的一次追忆和县政协委员张养吾、吴和旺等老先生生前所述，以及我外祖父江仙舫生前有关天主堂的讲述，参考有关档案资料，将其始末综述如下：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同外国侵略者签订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有准许美国人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的条款；《天津条约》规定，外国传教士可以自由深入内地。无论是洋教士或中国教徒，地方官都要“一体矜恤保护”；《北京条约》甚至订有听任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从此门户洞开，虎狼拥进。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者纷纷以条约为护符，持炮舰为后盾，以传教为借口，肆无忌惮地横行于中国城乡各地。

在这个大背景下，光绪初年，基督教中的天主教和耶稣教先后传入铅山。

最早进入铅山的是法国天主教的一个神甫。他于光绪七年(1881)在河口镇大航渡租了1栋店屋作为天主教堂，进行有关活动。河口天主教堂又称广信总教堂，由中华天主教江西教区余江分区直接领导，统辖广信府的玉山、上饶、广丰、铅山、弋阳、贵溪、横峰七县的所有教堂。这个教堂设正、副“总本堂”，总管各地教务。总教堂内设铅山(河口)天主堂，负责铅山全县教务，由神甫、副神甫和传道士等神职人员领导着圣本会、圣母会、圣花会、玫瑰会、四规会、祈祷会、亚纳会、善约会等有关组织。

基督教的另一派别耶稣教在铅山的活动，始于光绪十一年(1885)。其时，中华基督教上海内地会内的瑞典、芬兰两个国外传教会派出传教士到上饶、铅山等地传教。他们在铅山的河口、石溪、陈坊、荆林等地设立了礼拜堂后，英国传教士孙安心(女)于光绪十五年(1889)带领一批英国传教士来到河口镇，租用民房1栋，成立中华基督教江西河口内地会。3年过去，其信徒超过1000人，以致原租民房不够使用，于是筹集资金，在河口三堡街境(其址为现中共铅山县委大院)兴建新式教堂1栋、住房1栋以及附属建筑若干，即河口“耶稣堂”。为扩大势力范围，它们在乡下设立了分堂11所。

天主教堂建立后，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侵略者就开始了
对铅山人民的思想毒害、欺压和奴役。其罪行主要有：

侵权藏污，为非作歹。教堂建立之初，神甫开始传教时，

几乎无人信奉。为此，他采取了收买的手段，以6块银元的单价诱人入教。同时又恃领事裁判权强行为教徒取得有关非法特权。平民一经入教，即使违法乱纪，亦在此特权的庇护下，逍遥法外，就是已被收监，只要收到神甫发出的名片，官府也得立即释放。这样，除一些迷信者外，一些地痞流氓宵小或为有恃无恐地作恶，或为逃避官司而投入了教会怀抱。那时，每当教徒与平民对簿公堂，教徒可以挺胸直立，平民却必须跪伏于地。平民即便有理，也要被课以重罚。在那些入教的强徒中，最得外国神甫信任者有夏××、徐××、肖××、李××4人，号称“四大金刚”。夏××原系河口恶棍，入教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横行乡里，无所不为。他甚至公开在天星街设立赌局，聚众赌博，抽头攒钱。一新任治安官员，曾率人抓赌，当场将其抓获。不料外国神甫闻讯后，竟率领一批打手闯入官府，持枪逼令治安官员放人，还把这个人抓进天主教堂，绑在柱子上，拳打脚踢。后在地方官绅的斡旋说情下，此员才得生还。

以金钱诱人入教和收容强徒并纵容肇事的手段，使教会既站稳了脚跟，又买得了心腹，较快地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光绪三十三年（1907）编写的《铅山乡土志》就惊呼：“奉天主教人极多”。同时教会还将地盘扩大到农村，在四乡建立河口天主堂分堂，谓之“公所”。至解放前夕，其公所已增至永平、安洲、石塘、紫溪、湖坊、双港、车盘、五都、下坂贡家9处。

高利盘剥，掠夺田地。天主堂建立不久，即以发放高利贷的形式开始了对河口商民的剥削。其手段之狠毒比起土豪

劣绅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一为月息加一的高利贷。教堂针对河口镇商民特别是商人“结帐过年”的旧规，趁有些人因某种原因而发生的一时无力结算的困难，向他们施放这种高利贷。钱自旧历年底借出，正月底便要归还，只一个月就要加一的利息，且要从本金中预先扣下利息。虽条件苛刻，有些商家为了应急，还是不得不借；二为年息加二的高利贷。当时民间借贷，年息最高也只加一，而教堂不仅要加二，还要象月贷那样从本金中预扣利息；三为“铜锣债”。对因家小患上急病急需借债急诊或急待筹款解危的特困者，教堂除索取加二利息并预扣息金外，还要借方以仅有的田地房产作为抵押。当借家的病人死后，办丧事的铜锣一响时，教堂的管帐便带着打手上门逼债，抓住借方无力偿还的时机，强求其以所押产业作低价抵债。有不情愿者欲将产业以平价出卖后再行还款，但对于已经抵押给天主堂的东西，那是谁也不敢接洽的。教会这样巧取豪夺，仅是田地一宗就有数百亩之多。在教会高利剥削、掠夺田地的过程中，“四大金刚”之一的徐××尤其死心踏地地为其卖命。徐原是市井无赖，因在社会上混不下去而投入天主教，开始为神甫养马，后因“卫道”有功，被外国神甫委任为天主堂“管帐”，从中发了横财，由一个穷光棍变成为铅山县内财大气粗的大地主。

伪装慈善，虐待婴孩。为了引人入教，教会挂上一付慈善的面孔在天主堂内设立了育婴堂。至教堂被毁的那年，那里还有31名婴孩。它们特别欢迎女婴入堂。因为女婴长大后可以配人。一些无力在民间娶亲的穷人，便寄希望于此。但穷人欲从育婴堂获得女婴作媳妇，就必须全家受洗入教。

而且教会“纳婴孩入堂者，每给以酬报”，从不过问来历。一些歹徒和不法教民为获取酬金，便从事迷拐幼儿的罪恶勾当，以至县境内和周围各县经常发生幼儿失踪事件，弄得人心惶惶。在育婴堂的婴孩，由于屡受虐待和糟蹋，死亡很多。光绪二十五年（1899）天主堂被毁后，人们在其后院挖出了许多婴孩骸骨。这触目惊心的事实，揭穿了外国传教士的所谓“慈善事业”的虚伪性和残酷性。

毒化教民，制造分裂。天主教的外国神甫竭力向教徒灌输“世界上的人分为两大阵容——信奉基督教的和不信奉基督教的”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极力模糊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的界限，因而造成了某些教徒以敌为友、以友为敌的错觉。他们还强调，侵略中国的殖民主义者不仅是基督教的忠实信徒，并且是基督教的“护法”，教士与教民“在基督中实为一体”。而大多数中国人是不信奉基督的，也就是所谓“为罪恶所迷惑”的阻碍传布“基督福音”的罪人。教会这样刻意毒化教民思想的结果，是使某些教徒超脱于千千万万不信教的同胞兄弟之外，从而造成中国人之间、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对立情绪。有的教徒甚至于自觉或不自觉地和外国侵略者站在一起，迫害自己的同胞。光绪二十六年（1900）铅山知县陈元焯在一次给江西巡抚的呈文中就指出了河口“民教杂糅，动生衅端”的严重状况。一天，信江北岸有一老农上街卖菜，因避雨站在河口天主堂门前檐下。他只不过是好奇地朝堂内多看了几眼，就被教堂里的伙伕（教徒）不由分说地驱逐出去。老农不服，遂与伙伕争辩。不料伙伕竟施以拳脚，一脚击中老农小腹要害而使其当场倒

毙。

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略侵者的罪行是令人发指的。但在清政府媚外抑内政策的压制下，人民群众只得把仇恨郁积在心头，在等待时机奋起斗争。

光绪廿五年（1899），在一次“勒罚无辜”的事件引发下，埋藏在铅山人民心头的仇恨怒火终于猛烈爆发了。

这年8月，河口教民丁××，依仗天主堂势力，以极低价格强买一旅河弋阳客商的一批粮油，但遭到拒绝。丁恼羞成怒，便在外国神甫教唆下持其名片到河口分防府告状，同时大肆歪曲事实。同知王××为虎作伥，即派差将弋阳客商拘捕到堂，施以刑罚，进行勒罚。对此冤案，河口商民纷纷提出抗议。一时，其鼎沸之声不绝于街头巷尾。那时，弋阳西乡马槽500多人往葛仙山进香，路经河口，闻讯后，无不愤慨之至。当下弋阳户书陈瑞堂等怀挟公愤，为首结集进香人众，涌向天主教堂问罪。河口一批在教堂欺凌下而负屈饮恨的平民，有500以上，亦踊跃加入复仇队伍，向教堂冲去。顷刻之间，铅弋人民即汇集成为1000余众的反帝大军，包围了河口天主教堂。未料，外国神甫却在河口地方官员的保护下，遁至驻河水师炮船上避风。当民众冲进天主教堂，没有找到外国神甫和丁××时，更加怒不可遏，遂纵火焚烧起天主教堂来。一时，烈焰腾空，“打倒洋鬼子”、“洋鬼子滚出中国去”的呼喊声惊天动地。面对反帝怒火，成百上千的围观者，无不拍手称快，争相呐喊助威。不久，天主教堂便被烧成一堆瓦砾废墟。河口分防府派来弹压的清军，见众怒难犯，也只好悄悄退走。这时躲藏在信江炮船上

的外国神甫，吓得面无人色，后在炮船护送下，逃离河口去九江避难。

焚毁教堂的反洋教斗争的影响波及全县。久受教会欺凌的平民，一个个扬眉吐气；一些仗势欺人的教会爪牙则龟缩家中或藏匿它处。教会心腹、石塘镇教徒陈某在由河返乡途中，被在石塘从事纸业的抚州帮10多人围攻，“大受屈辱，亦颇损失财物”。

河口天主堂被毁后，天主教江西教区护理主教即出马向省巡抚交涉。在某主教的压力下，河口教案作为一次反帝爱国斗争，也和全国各地教案一样，被定性为“痞党纠众抢毁天主教堂事件”，以镇压群众，赔偿巨款和重建天主教堂的屈辱条件告终。而且“赔款之巨，为江西从来所未有”，铅山赔款金额高达库平足纹银12000两。对参与这次斗争的民众，除弋阳陈瑞堂等人被官府作为“首犯”严惩外，铅山经某主教开具名单缉拿的“滋事人犯”有李大光仵、胡兴隆、蔡义发、邱亿和，邱义和、丁洪顺、祝维三、邱也麻子共8名。他们经铅山知县拘案审讯，除个别人，其余均给以“笞责两百、枷号两日”的处罚。其不在名单的“滋事人犯”则有张大苟、丁正仔、刘学茂、丁眉仔等10多名，均经抓拿，于刑责后开释。另有李锡福、叶良金、杨歪倪、虞细毛4人，经押送贵溪会审后，发回铅山收禁，饱受“械系垒垒，校杖交集”之痛苦。

如上处理结果呈报到省后，某主教仍不满足，再次写信给江西巡抚，指责铅山县轻纵首要人犯，提出“邱义和、丁正仔、蔡发义等实系抢拆要犯，仅笞责二百、枷号二日，不

足蔽事”；“李大光仿……为痞党纠众抢毁河口教堂的首要重犯，不能听其轻纵”，要“拘案从严处理”。巡抚接信后，即令饬铅山县“迅将应拿应办各犯，刻日比差勒缉，按名务获，分别严讯确情，照例究惩”。好在其时的新任铅山知县陈元焯颇具民族气节，对主教的凌人霸气十分反感。他接文后，立即“详稽案牒，博访輿情”，根据调查事实呈文到省。文中对某主教关于对抢拆要犯予以严惩各节，据理逐条辩驳，并要求“宪台坚持前议，毋任翻异，以清界限，而断讼根”，拒绝“再事苛求，致滋冤滥”。在陈元焯的坚持下，某主教那严惩有关人员的妄想终于破灭。

然而在结案定约中，是订有择地重建天主教堂的规定的。于是，外国神甫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卷土重来，在河口镇火爆街西侧觅得新址，以所得赔款大兴土木。其地东至街道，北临福惠河与油麻滩隔岸相望，面积约5000多平方米，由教会无偿借用99年。新建的天主堂，规模很大，有能容纳上千人的礼拜堂、三层楼房的官厅和仓间、男女圣堂、育婴堂、医务所、学校、饭堂以及执事人员和丁役宿舍等，建筑面积为2846.87平方米。其范围包括现今的县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人民医院门诊部、商业局仓库等单位的全部场址，比原天主教堂扩大了数十倍。

火烧天主堂的河口教案，虽以镇压群众、赔偿巨款、扩大重建天主教堂为结果，但它毕竟显示出人民群众反帝爱国斗争的强大力量和不屈精神。一些外国传教士由此认识到光靠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欺压中国民众是不可取的，这样只会激

发斗争和矛盾。因此，他们开始调整自己的策略和手段。火烧天主堂后，教堂总本堂改由法国籍奥地利人×××担任。此人善伪装，常以“和善正直”的面目掩盖其为帝国主义侵略效劳的真貌。他接任后，采取了一些怀柔措施，如增设了教会医务所为平民治病，以引人入教；开办天主堂小学（后改名德育小学），在教授文化知识的同时，向儿童灌输资本主义文化以奴役思想。1926年，河口天主教堂由法国教区改属美国教区。1942年，法籍奥地利人病死，由副本堂美国人×××继任总本堂，直到河口解放。1951年此人离境返国。从起始至此，天主教在铅山先后发展教徒1700余人，1949年解放时尚有1172人。耶稣教的“中华基督教江西河口内地会”，则于解放前夕的1948年停止了活动。至此，作为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外国教会在铅山70余年的罪恶活动，才告匿迹。

新中国成立后，铅山基督教仍然存在，其教民在人民政府的引导下，走向了自治、自传、自养的“三自”爱国主义健康道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铅山的苏维埃政权建设

吕 品 潘逢春 彭光正

我们在参加《中国共产党江西省铅山县组织史资料》编纂工作的过程中，有机会了解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铅山苏维埃政权建设的一些资料。我们深感这些资料从一个地方的具体实践，反映了我们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人民政权的伟大实践。因此，我们特将这些资料整理成篇奉献给广大读者，以期引起知之更多和更详的同志对此资料的补充和修正。

在这里，我们先就铅山苏维埃政权产生的前因，作一个简单的交代。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从铅山来看，光复后成立的江西军政府，命令“各道、府、厅、州、县所属各官，仍着照常视事。”稍后，改县署为公署，改知县为知事。然而，在以后的军阀纷争中，铅山一直被军阀孙传芳部所占，县公署只是他们鱼肉百姓的工具而已。

1926年，北伐军攻克铅山，废县公署成立县政府，

改知事为县长。北伐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影响、推动和组织下的革命正义战争，但由于1927年“四·一二”政变的发生，国民党右派背叛了孙中山先生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使大革命运动归于失败，铅山亦被白色恐怖所笼罩，铅山县政府又成为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

铅山苏维埃政权就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以后，方志敏等在1928年1月领导的弋阳、横峰农民起义和同年冬在闽北崇安爆发的农民起义，从北南两面给铅山以直接的革命影响。从此，铅山人民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武装斗争开辟苏区，建立红色政权，进行土地革命。它自1930年8月铅山县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起，到1935年春铅山苏区失守止，历时四年多。在此期间，铅山境内开辟了两块县级苏区，分别建立了铅山、上铅两县苏维埃政府。此外，还在信江南岸的沿河地带开辟了两县特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政权组织。苏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乡、村为群众大会），选举产生了县、区、乡、村四级苏维埃政府。人民通过自己的政权，进行了按人口平分土地的土地革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解放的苏区人民，建设苏区，保卫苏区，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情空前高涨。在苏区革命鼎盛时期的1932年，铅山全境，苏区占60%，游击区占11%，特区（秘密工作区）占16%，使之成为赣东北苏区连接闽北分苏区的红色通道，从而实现了中共赣东北特委提出的打通赣东北的战略目标。

现就当年苏区政权的建立和演变情况，分述如下：

一、铅山县苏维埃政府

“弋横起义”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对与弋横毗邻的新滩、汪二地区的人民以很大影响。这带地区的贫苦农民很快地兴起了一个“上名字”的热潮。“上名字”是群众向当地领头人报名要求参加“农民革命团”的秘密串连活动。

1929年，横峰、上饶两县苏区向信江沿岸地带扩展，在铅山新滩、傍罗地区的一些村庄，陆续建立了一批村苏维埃，组织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初步形成了一个铅山信江北岸的红色区域，并向汪二地带发展，为铅山县苏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30年4月，赣东北红军在千余农民的配合参加下，攻占了庙湾，形成了一个仅隔一江而直逼河口的势态。同年6月，赣东北红军一度攻克河口，迫使国民党驻军由向北岸进行袭扰的攻势而转为在南岸凭江而踞的守势。中共赣东北特委为了开辟南岸苏区，决定在北岸辟建铅山县苏区。

1930年8月，铅山县工农兵代表会议在新湖塘召开，选举产生了铅山县临时苏维埃政府，舒有发为主席，同年8月由黄怀仁继任主席。在这次会议上还宣布了中共铅山临时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

临时县苏隶赣东北特区革命委员会，其辖区以原上饶县苏区的傍罗为一区，横峰县苏区的新滩为二区，新辟汪二为三区。以后，由于战事的反复，临时县委和县苏曾退驻铅横边境的（横峰）港西。

1930年12月，赣东北红军再度攻克河口，战局出

现了好转。临时县委当即在港西召开中共铅山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一、正式成立中共铅山县委员会；二、召开铅山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铅山县苏维埃政府；三、根据赣东北特委指示，县委、县苏正式成立后，立即南迁石垅，加强对南岸革命斗争的领导。

同年底，铅山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铅山大山头刘家召开，宣告铅山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并于翌年1月南迁石垅。此时，于1930年6月“东坑暴动”后在石垅建立的南岸革命委员会随即撤销，并入铅山县苏。从此，铅山县苏改隶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

“苏维埃”是由俄文音译而来的，是会议的意思。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它成为了在各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工农民主政府的特殊名称，所以其行政区域亦称为“苏区”。铅山建立苏维埃政权时，各革命根据地对政权组织形式尚未统一。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发现其组织形式是受到闽西1929年8月制订的《苏维埃组织法》的较大影响的。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每半年举行一次，由其选举产生的苏维埃政府为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县苏维埃政府由大会选举委员13——17人，组成执行委员会，并互推常务委员5人（内主席1人）组织常务委员会。其常设工作机构为各委员会。到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制订了《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后，苏维埃政权建设进入了一个统一法制规范的时期。铅山县苏维埃政府在1932年11月，按照《组织条例》将常设工作机构由委员会改设为部，设有军事、政治保卫（分局）、邮

政、财政、裁判（负责审判）、国民经济、工农检察、土地、内务、文化、劳动、粮食诸部。

从当年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情况来看，其所体现的工农民主性质，在按期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这一组织制度方面，是非常突出的。尽管是在战争年代，铅山县苏维埃政府从1930年12月成立起，到1934年10月转入游击战争的3年又10个月的期间内，共召开了7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达到了苏区组织法规对县级每半年开会一次的要求。

现将铅山县历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情况，结合苏区的发展情况，分述于后：

铅山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1930年12月在大山头刘家召开，选举产生了县苏领导机构，黄怀仁为主席。赣东北特委派萧韶参加大会，提出“打通南北苏区”的号召。“北”是以横峰葛源为中心的赣东北特区，“南”是其所辖的闽北分区。这一号召后来发展成为“打通赣东北”的战略目标。会后，县委、县苏南迁，先后驻曹家畈、车盘、邱林，并将北岸苏区合并为第一区，划原南岸革命委员会辖区为第二（车盘）区、第三（石垅）区。

铅山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1931年1月在武夷山高店召开。大会根据赣东区苏维埃准备委员会（1931）第一号通告的精神，决定在苏区进行土地革命；动员苏区人民积极参加红军；县苏常委以特派员名义常驻各区协助工作。大会选举了出席赣东北特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10名）和县苏领导机构，林芳祥为主席，同年8月由王

仰彬继任主席。会后，县委、县苏着手培训干部，建立和健全基层组织，进行按人口平分土地的土地革命，巩固以石垅为中心的铅山县苏区，并把武装斗争向紫溪、杨村一带推进。县苏特派员则分别奔赴新区开辟工作。1月底，特派员叶桑田刚刚进入紫溪，就被当地地主武装“守望队”所杀害。特派员姚荣庆前赴后继，由当地群众林国光、江有祥等为向导，又进入紫溪进行活动，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同年3月，第四区在紫溪郭家建立。与此同时，县苏在赵家排、观星岭、刘家源3地相继辟建了第五、第六、第七区。苏区人民的参军参战热情亦空前高涨，南迁时从北岸带来的赤警连，到5月已扩大为赤警营。

铅山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1931年10月在石垅召开，中共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到会指导。大会的中心内容是，动员和组织新区群众进行深入的土地革命，积极支援革命战争，猛烈地扩大红军。大会选举了县苏领导机构，刘忠洪为主席。会后，根据苏区不断扩展的形势，县委、县苏从山上的石垅迁到山下的紫溪郭家，并将设在郭家的第四区改为“模范区”（意为区政权建设工作的示范），第四区则迁驻坑口。后又相继在杨村局里、石塘港背开辟了第八、第九区，在薛家边建立了特区。赤警营又随着武装的扩大改称为独立营，下编第一、四、七共3个连。

铅山县第四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1932年7月在紫溪召开，中共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到会指导。大会根据分区委书记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改选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决定，对全县政权建设工作作了部署；选举了县苏领导机构，陈凤山为

主席。这时，县委、县苏已从郭家迁到紫溪街内的吴家祠堂。会后，在黄蜂窝、叠石、港东相继开辟了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区，在桐木关、湖村建立了特区。同年11月，红军武装已由独立营扩编为独立团。12月，民兵武装由赤卫队改称为赤卫军，全县编为一个军，称“铅山县赤卫军”。至此，一个建有13个行政区和3个特区的拥有1个红军独立团及民兵武装的以紫溪为中心的铅山县苏区已经形成，并与上铅县相互连接。

铅山县第五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1933年2月在紫溪召开，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代表曾昭铭到会指导。大会部署了突击扩大红军和查田查阶级的任务；总结了前一阶段肃反工作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选举了县苏领导机构，江正洪为主席。

铅山县第六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1933年9月在紫溪召开。大会根据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1933年7月）关于各县的区、乡改选问题的训令，部署了工作；选举了县苏领导，林长兴为主席，次年3月由林本熙继任主席。同年11月，铅山县独立团奉调闽北，铅山县重新组建红军。从1934年春起，铅山县苏区在国民党集中兵力的进攻下，辖地逐渐缩小。5月，紫溪被国民党二十一师攻占，县委、县苏撤至石垅。

铅山县第七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1934年10月在石垅召开，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曾昭铭到会指导。大会根据当时形势的严重性，决定将全县党、政、群组织的干部与独立营及各区游击队统一改编为铅山县游击大队，以集中

力量迎击国民党的武装进攻。大会选举了县苏领导机构，林本熙为主席。会后，县游击大队组成，县苏主席林本熙为队长，县委书记黄怀仁为政委，在武夷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935年春，铅山苏区失陷，游击大队转入闽北，编入闽北军分区独立师，进入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二、上铅县苏维埃政府

1931年2月，中共闽北分区特委根据赣东北特委关于“打通赣东北”的指示，以原崇安红军在福建崇安与江西上饶、铅山交界山区开展的武装斗争为基础，在炭坪建立上铅县特区。同年4月，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大横召开，选举产生了特区苏维埃政府，第一任主席为方友三，以后继任的有夏仁才、连明水。特区苏隶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先后驻炭坪、江东源、茶坑源。

特区委和特区苏领导的武装斗争日益扩大，辖区的政权建设由建立乡苏发展到建立区苏。

1932年4月，闽北分区委根据特区形势的发展，决定将上铅特区改建为上铅县苏区，在垅西召开了上铅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19名委员组成上铅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第一任主席为余加发，以后继任的有余细姘、张福斋。县苏仍隶闽北分区苏，先后驻大横、张家湾、小横、中铺山、罗东坑、里洋关、下渠。上铅县苏区相继建有6个行政区，形成了一个以英将为中心的县级苏区，并与铅山县苏区相互连接，共同构成了“铅山苏区”。

1934年3月，上铅县苏区在国民党集中兵力的进攻下，县委和县苏撤至下渠。闽北分区委根据形势，决定撤销